

## 赖德烈美国中国学的维度、比较与特色

○ 王思聪

(北京联合大学 商务学院,北京 100025)

[摘要]耶鲁大学赖德烈教授是二十世纪30、40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领导者,被誉为“盲人国中的独眼人”。本文对赖德烈中国学的源起、动力和学术维度进行了分析,并从关注角度、学术方法和价值取向三个角度,对赖德烈中国学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学派中国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赖德烈中国学的研究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关键词]赖德烈;美国中国学;学术地位;评价

### 一、赖德烈中国学的源起和动力

#### (一)神圣使命的驱动:“为耶鲁、为上帝、为美国”

赖德烈生于清教徒家庭,祖先是為了躲避路易十四的宗教迫害于1693年从法国移民到美洲的胡格诺派教徒,具有开拓者的基因。清教徒家庭的影响使他拥有对基督教的虔诚和复兴基督教的使命感,“他们把北美大陆视为复兴基督教的理想之国,是建立未来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这些清教徒看来,他们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sup>[1]</sup>赖德烈说家庭因素对于他后来从事中国学的研究学术事业具有重大的影响。耶鲁大学是美国宗教传统最为深厚的大学之一,1701年建立之初就是由清教徒牧师发起的为培养牧师、教化新移民而建立的,因此成立之初就承载着强烈的宗教使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899年,耶鲁选举产生第一位世俗校长之前的大约二百年,校长一直都是牧师出身,直到进入二十世纪才转变为非教派大学。<sup>[2]</sup>作为耶鲁大学的青年学生,赖德烈积极参加了如火如荼

---

作者简介:王思聪(197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0级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生。

的学生海外传教志愿活动。此时美国的海外学生志愿活动因为受到政府的持续支持也越来越高涨,罗斯福总统、威尔逊总统都曾经非常支持海外传教活动,把它当作建立文化帝国、传播普世价值的最有效方法。<sup>[3]</sup>

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开端与入华传教的传教士是分不开的。1901年,耶鲁大学青年学生组织了雅礼会专门前往中国传教,并于1906年在长沙开办了雅礼学校,到1914年,正式成立雅礼大学开始招本科生。湖南雅礼会的宗旨就是:在基督的庇佑下为中国人民培养领导人,期望以基督教重塑中国人的性格与中国这个国家。晚年,赖德烈曾经在自传里不无遗憾地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长沙的学生,但是不是在耶鲁开办的学校,如果是,他们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都将会与20世纪的50、60年代不同。”<sup>[4]</sup>赖德烈正是怀揣远大的宗教理想走进中国,从而得到近距离观察中国文明的机会,“为耶鲁、为上帝、为美国”的耶鲁传教文化是其最初汉学研究的学术动机。

## (二) 师从汉学家卫斐列

耶鲁大学是十九世纪唯一提供远东课程的美国大学,耶鲁大学第一任专职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授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著名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爵士。卫三畏是美国汉学第一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历任传教士、外交家,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执掌教席,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大学开设汉语课的教授,耶鲁大学也成为第一个拥有汉学课程的美国大学,耶鲁大学以后也陆续聘请了一些教授开设汉学课程,并把这一优势一直保持了几十年。卫三畏的著作《中国总论》在1848年出版,引起很大反响,被视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介绍中国的综合性书籍,也因此奠定了卫三畏“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地位。后来卫三畏的儿子卫斐列继承了父亲的汉学事业,成为耶鲁著名的汉学教授,赖德烈就是在其指导下获得的博士学位。卫斐列是一位热心帮助学生的老师,赖德烈不止一次在书的前言中提到对恩师的感激。赖德烈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开始于卫斐列的引领,他后来的著作《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从结构上、观点上有很深的《中国总论》的影子。

## (三) 美国实用主义文化

赖德烈的中国学思想代表了美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17世纪的中国热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文化的交流和宗教的扩张的基础上,而美国最初的动因也是出于此。实用主义原则一直贯穿于美国的文化研究当中,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因为美国中国学的产生最初是为传教服务,对中国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考察,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历史、宗教和社会以及对外关系,这些主要是出自传教士或者传教士家庭的学者之手。但是因为欧洲文化历来对美国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在初期缺少向近现代研究转化的持续动力,多数延续了欧洲汉学研究的传统和思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洲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被视为主流,美国学者多数遵循欧洲汉学家的脚步开展对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和考古史的研究。而对近代史的研究

只有像赖德烈等少数学者依靠自身的远见和兴趣,顶着被欧洲汉学权威视为不入流的危险,开始研究中国的近代史,而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则只是被视为一个理解的基础和参照,为更好理解现实提供一个途径和背景,这种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二战后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政府资助下的新的现代中国学研究的逐渐兴起,新一代学者普遍把研究重心下移到近现代史部分,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流。

## 二、赖德烈中国学的三大学术维度

### (一) 近代中国历史文化

赖德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1934)、《中国》(1964)、《中国的发展》(1918)和《中国近代史》(1952),其中《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他的代表作,影响最大,奠定了其在美国中国学研究权威的地位。

赖德烈对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以西方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状态、近代西方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可能道路等问题为主。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互动中,赖德烈阐释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根源,他把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化改造比喻成像“火星上的人把他们和他们的文明强加于地球上的人民一样大的革命。”<sup>[5]</sup>除此之外,赖德烈以“他者”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对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的优势劣势的分析、以及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的分析,影响了美国几代人对中国文化的印象。

对中国传统文化,赖德烈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与欧洲的古罗马文明相比毫不逊色。他说:“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他们的政治、社会结构、经济、哲学、艺术和文学都是人类最卓越的成就之一。”<sup>[6]</sup>他从两个角度考察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格的塑造;二是从对外来异质文化的态度。赖德烈对儒家文化及其倡导的人性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文化的优点在于“强调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谆谆教导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强调智力和崇高的道德品格,并给予家庭比较大的稳定性。”<sup>[7]</sup>赖德烈看到中国文明在西方的冲击下正在发生的巨变,他认为“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处在崩溃之中,这种文化的冲击主要源于西方,中国生活的每个侧面都在改变。”<sup>[8]</sup>而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化社会遭受冲击的开始。由于鸦片战争,中国突然使人产生了相反的感觉,中国文化开始衰微,变得“奄奄一息,由光荣的过去大为衰落了。”<sup>[9]</sup>中国衰败的外因是中国被打开大门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内因是中国文化的静止性、轻视军人的传统、没有把技巧发展成科学适当方法和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赖德烈不完全赞同卫三畏的“孔子加耶稣”模式,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代替儒家是一个大的革命,只有打破旧的制度和思维,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

## (二) 中美政治关系视野下的文化考察

中美关系史研究一直是赖德烈的研究兴趣,从他最早的博士毕业论文《早期美中关系史:1784 - 1844》,到后来的《美国跨过太平洋》、《美国在远东的记录》、《共和国下的中国》都反映了赖德烈对中美关系的思考。《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 - 1844》是美国学者研究中美关系的第一本著作,该书被美国史学界公认为“是对这个时段美中关系所做的唯一一个全面的调查。”<sup>[10]</sup>佩森认为这本书“代表了谨慎研究的结果……广泛的材料收集、以学术的精确性和判断来组织完成”。<sup>[11]</sup>另外,赖德烈还出版了《美国船航行到中国》(1927)、《中国的发展》(1937)、《美国跨越太平洋》(1946)、《远东简史》(1947)、《未来的中国》(1949)、《美国在运动记录》(1952)、《中国近代史》(1954)等著作,对早期中美关系进行了详尽研究。包含了对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以及中美关系历史的考察,也包括了战后局势的判断和对未来形势发展的预测,以此为美国的政策决策服务。对于中国、日本和东亚其他地区当前的局势,包括东印度的局势和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判断被视为是“非常公平的、无偏见”。<sup>[12]</sup>

关于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救赎,赖德烈认为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对中国的帮助是符合道义的、自我牺牲的,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在未来对亚洲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这是美国不可逃避的责任。赖德烈对美国在改变中国所引起的作用念念不忘,他认为美国应该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对鸦片战争中美国未能发挥作用表示遗憾。二战后,赖德烈认识到中国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已经假定我们在远东的主要责任并且深深进入太平洋邻居的事务中。不管好坏,我们的未来与远东特别是人口最多的中国人紧密地绑在一起。”<sup>[13]</sup>基督教所倡导的美国的民主自由如果能够填补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必将能够使中国像日本一样国家富强。他心中又是以宗教文化征服东方文化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这体现了赖德烈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矛盾。在长沙雅礼会,尽管他自己认识到雅礼会包括他自己都是文化入侵者,但是他认为这是对的,对中国有利的。赖德烈认为作为侵略文化的基督文化,对于帮助中国是有益的。他说:“我们相信,即便我们没有来,变化也早已经产生了。我们希望,我们能通过一己之力,帮助青年人从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中学到精华成为基督信仰激励的新青年,以此改良社会,帮助中国度过不可避免的痛苦的转型而变得更好。”<sup>[14]</sup>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赖德烈并没有对中国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持否定和蔑视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能够接纳基督信仰,就像青年会在中国努力寻求的目标那样,那么对于引领中国的未来是一件好的事情。<sup>[15]</sup>从30年代开始,赖德烈开始研究和平主义,提倡不以战争方式解决问题。他写了《世界民主》《基督联合》等著作和文章,开始提倡在世界范围内,在基督联合基础上的民主。

## (三)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赖德烈的传教士身份使他对基督教历史一直非常感兴趣,他的《基督教扩

张史》7卷被视为关于基督教的经典之作,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一时无人能出其右。1929年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同样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该书无论是从内容的广度深度,还是从资料的可信度、立论的权威度来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一直是该领域的绝对权威读物。

首先,赖德烈从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结合中国已有的宗教基础和传统核心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接受的可能性。赖德烈看到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主流地位和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影响,赖德烈把它与古罗马的文化相提并论,肯定了其社会安定方面、国家统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助长了惰性,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思想的创新,缺少生气;其次,关于基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可适性,赖德烈考察了历史上的佛教的传入,认为,只要基督教能够改变一些禁令向儒家的思想接近,是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逐渐被接受并成为中国思想信仰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因为佛教采取了改变自己适应中国文化的一些措施,赖德烈认为如果基督教可以这样,也一样被接受;第三,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前景,赖德烈并不乐观。他说:“任何一个新来的宗教在中国都是不容易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里“已经有很多具有组织的、精致哲学思想的宗教,而这些宗教在人们的传统和社会体制中具有深厚的根基。”因此一个新来的宗教可能面临几个命运,如果弥补了原有国度的需要而且能容忍其他宗教共存则可能被欢迎,但是也可能被吸收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容忍本国当地的信仰,必须攻克这个国度生活和思想的某些特征并必须改变或消除他们;第四,关于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推动,赖德烈认为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影响是正面的居多,对中国的民生改善是有帮助的。他甚至自信的认为基督教的传入并非为了对中国实行殖民,而是把中国带入世界基督教联合的大家庭中,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地交往,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安全。这与费正清的观点相左,费正清认为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的文化是破坏性的,带来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动乱。

### 三、赖德烈与费正清中国学的比较

赖德烈与费正清是不同时期美国中国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经是美國最著名大学的远东研究教授,赖德烈在耶鲁,费正清在哈佛;前者是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后者是新的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两人都曾组织过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组织,都曾担任过美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会主席和美国远东研究会主席,并且作为专家被美国官方聘请为远东事务顾问;两人关注的重点都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中美政治等;但是,他们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 (一) 关注角度

赖德烈把他的研究放到全球的大背景中,这使他的研究因为拥有一个宏大的视野。赖德烈把传教事业作为他学术研究和生活的重心,以基督理解历史,认

为所有现实是在上帝的控制之下。因此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基督教在最“伟大世纪”中的自然扩张,是“上帝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革命,赖德烈认为只有皈依基督教,中国文明与美国文化捆绑在一起,才能为中国人民谋得福祉,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只是说明中国革命的不彻底,并且是一场灾难。对于皈依了基督教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和蒋介石,赖德烈抱有很大好感,而对于他们的对手则抱有偏见。赖德烈的研究兴趣是出于作者本身对世界、对宇宙的探知的兴趣,对中国的研究也是处于对一种文化的兴趣,处于对世界的探知。由于赖德烈与中国的接触期是中国处于历史发展谷底而美国在逐渐上升到世界第一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中国是有极度的优越感的,即便是有对中国曾经是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样的认知,对于中国近代无力抵抗外国入侵的羸弱现状,思考的立场是如何以基督教覆盖中国建立一个新大陆,赖德烈曾经说,由于旧的儒教的崩溃造成的中国人的思想真空由共产主义替补了,而不是基督教,在他看来是深深的遗憾,并且认为中国的革命不彻底,没有最终完成,因此中国的革命还是处于曲折变化当中。这充分说明了赖德烈的美国主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模式。

与赖德烈不同的是,费正清认为他的治学方法的精髓在于“用到的哈佛大学学到的世俗的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费正清研究的黄金时期是在二战之后特别是中国建国后,尽管经历了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低潮期,但是在这之后,费正清一直是以中国学研究专家著称,由于二战之中在亨利卢斯的极力撮合下美国和中国短暂结盟,到中国建国后的一系列强势复兴包括朝鲜战争、越南出兵,再到国际社会冷战的格局,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改变了,基督教传播的热点暂时被政治、军事上的利益所代替,美国需要考虑的是了解中国,为它的对外政策服务。费正清之于赖德烈中国学研究的立场差异,与其说是两个人所受的教育的不同,不如说是两人所处时代的根本不同和基于中美之间关系的转变。赖德烈所处的时代,宗教气氛浓厚,且美国之于中国当时的境地,是拥有政治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刚刚被外来的势力打破大门,军事政治无以抗衡,接连被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德国、美国等国分割,闭国自守的中国人完全没有自卫的能力。而1949年后的中国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树立了相对比较平等的国际身份,因此,美国政策需要考虑如何平衡国际关系。

## (二)学术方法

赖德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延续了美国汉学研究从卫三畏开始的传统方法,即整体方法的跨学科运用。把中国当作一个整体文明来研究,赖德烈的中国学系统介绍了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艺术、语言、文学、教育等方方面面,已经具有了跨学科的性质,同时,也包含了对中国的综合介绍,总结了美国当时研究中国的最好成果。《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整体进行的研究,其余的几部书中,赖德烈也习惯于做文化、政治、宗教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虽然由于侧重点不同,所占比重不同。作者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对中

国文化所做的每一个判断都隐含着基督的标准,对于政治的特别关注也使他的研究中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虽然赖德烈的整体方法的跨学科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对具体问题研究的“不够精深”在所难免,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大。虽然赖德烈在自己写《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候,在很多方面,尽量让自己不限于泛泛,但是也难逃类似的苛责。费正清并不认可老一代的汉学家的传教士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他明确说:“他用到的哈佛大学学到的世俗的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治学方法,而不是用非理性的神学方法。”费正清曾把赖德烈的跨学科整体研究方法评价为:“把中国作为文明整体进行研究的传统汉学历来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而且这确实也是它和美国的专业史学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sup>[16]</sup>

### (三) 价值取向

赖德烈认为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只讲究功利性,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研究,以丰富世界文化知识和种类也是甚至是更重要的中国研究的价值取向,而费正清认为,评判中国的标准不能用美国的标准,讲究中国研究的功利性,学以致用作为美国对外关系政策的制定给以指导天经地义,赖德烈认为基督教最终会顺利,上帝制定了基督教在全球扩张的进程,可能有挫折和坎坷,所以需要传教士的艰苦努力,把上帝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费正清认为我们没有义务把传播和保持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最高义务,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是我们的责任。赖德烈认为美国是引领和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现代化教育医疗工业等,是保持中国独立免受帝国主义瓜分,与中国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费正清认为美国本身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而且美国对中国的扩张是经济的、宗教的或者民族主义的,而且是这些扩张的总和。

## 四、赖德烈中国学的评价

### (一) 学术地位:盲人岛上的独眼人

赖德烈是近代美国汉学萌芽时期的开拓者,在美国汉学还是一片荒野的时候,他开始披荆斩棘,埋头找寻一条出路,在美国汉学从继承欧洲汉学传统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化的过程中,赖德烈发挥了本土汉学家应有的巨大的作用,他的书扩充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使很多美国人形成了对中国的温和、崇礼的印象,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对中国近代史的关注、对中国对外政治关系的研究兴趣也激发了中国研究的多重视野,他对中国研究的很多观点和架构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包括费正清。在促进中国研究发展的道路上,赖德烈功不可没。扩大中国研究的影响,使中国研究进入大学的课程计划和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培养专业人才,赖德烈和这一代的美国汉学家们设计的美国中国研究之路步入正轨。赖德烈晚年在自传中自嘲“盲人国中的独眼人”这也道出了美国中国研究的早期状态,在美国对中国研究还是茫然无知的时候,赖德烈是少数几个开始做中国研究并且把中国知识带给美国人的人。

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开创者,可以说都是划时代的。一个是与传统的基督教史,赖德烈走出了划时代的一条新路,一个是对于东方学和中国几近一无所知的美国,赖德烈在美国汉学研究的蛮荒之地种下了第一棵树。

## (二)研究方法

赖德烈中国学采用的是跨学科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使他领先一步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学家先驱。20世纪的20年代,赖德烈已经把研究视野扩大到全球,正像他在80多岁时写的自传《超越边界》的前言中说的:“回首这些年,我好像一直在开辟新路。一次又一次,我与他人一起站在前沿。”他试图以“上帝的眼睛”看待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使他能够从一种文化中抽离出来。<sup>[17]</sup>他把基督教的扩张看作是文化的流动,以综合、联系的观点、而非分解的观点看待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7卷本的基督扩张史、基督传教史,这些著作被认为是开拓之作,无论是从研究视角和论证形式上,从全球视野看待基督的传播无疑是一个创举,它使人们从自身文化中抽离出来,把地球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中关照局部,从整体中看到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这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文化,在基督教的扩张史中,赖德烈的选题反映了他全球视野和地区化并重的一贯的思维方式。另外,赖德烈中国学还采用了世俗化的实证主义方法。赖德烈中国学的哲学基础是典型的“世俗化”,他尽管以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为视角,但是为了客观公正,还是以世俗化的实证主义为基础。由于受到的专业训练是历史学的训练,而且在那一时期美国一直深受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影响,赖德烈一生都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研究。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也是以这样的方法,注重事实的考证,而非借助神学的不可知力的解释。赖德烈总是希望尽可能准确地用事实表达他对历史事件和背后规律的判断,让读者脱离作者的偏见准确看到历史的模样,他总是把事实摆在那里,但是却吝惜讲道理,这曾经是他被质疑不够专家的证据,也是很多人读过他的著作之后的共同的感受。对此,他认为很多时候即便是专家也会犯错误,因此,他不希望自己也贸然行事。而他的学生替他辩驳说:“他的观点隐藏在他列举的事实中。”言外之意是他希望读者通过他列举的大量事实自己得出结论,他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判断。

## (三)突出特色

### 1. 时代赋予的宗教色彩

赖德烈视中国为基督教徒东征的又一次尝试,是基督徒在美洲大陆成功的复制。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基督教要征服的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而不是印第安人那样的部落,同时中国人的多神崇拜和骨子里的无神论也和基督教的一神论有着根本的冲突,因此,赖德烈认识到在中国的传教必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这种冲突的不可调和也加剧了传教的困难,他主张为了让当地人接受基督教,是可以承认中国人祖先崇拜等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因此说,他有时又是变通和灵活的。而当共产主义代替了基督教在中国夺得了胜利的时候,赖德烈



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随着 50 年代中期费正清中心在哈佛大学的建立,世俗汉学越来越大行其道,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经费,扶植和培育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曾经宗教是美国 20、30 年代人们的兴奋点,随着宗教狂热的退潮,政治成为了美国人的第二个兴奋点,与之相联系的哈佛学派的汉学研究既是这种热潮的产物又是它的助推器,它从国家政治利益角度出发对中国的研究必然包含了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社会结构、制度等综合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由训练有素的中国学学者使用中国的档案、文件,也更增加了其专业性和可信度,因此,赖德烈的带有宗教背景的汉学被逐渐淡忘了。不过,赖德烈对中国学研究的开创新贡献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 2. 关注政治和国家利益

赖德烈对政治的关注一直在于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方面,虽然他在历史学会的演讲中呼吁脱离政治的功利性,但是他也不否认,对于政治的兴趣一直大于其他的历史学家,并且,也不讳言他是:出于美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赖德烈的实用主义和费正清是如出一辙的,政治利益和宗教传播相结合,是赖德烈比在他之前的其他美国汉学家走得更远的一步。20 世纪是世界风起潮涌的日子,一战、二战、中国的建立对于中美两国都是大事件,赖德烈一直从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寻求处理中美关系的最佳模式,他承认:我总是从维护美国的利益出发。

## 3. 过渡时期的混合特色

尽管赖德烈的中国学研究是以基督教的传播为出发点,其哲学基础却是典型的“世俗化”实证研究,<sup>[18]</sup>落脚点是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社会的影响,而非神的影响。这一方面是与当时历史研究界流行的“力求客观、摒弃神的崇拜”的新思潮相合。<sup>[19]</sup>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赖德烈所说:“自己一直以来受的都是历史的训练而非神学的训练。”<sup>[20]</sup>赖德烈的汉学师承卫三畏儿子卫斐列教授,秉承了卫三畏温和的中国观,学术仍然有像传统汉学一样重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的倾向,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发展》,在这些研究中,赖德烈发现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巨大潜力,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要“低下头虚心学习”。<sup>[21]</sup>但同时也注重对现实的研究,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如《中国近代史》、《远东近代简史》、《共和制下的中国》等,这体现了赖德烈多样的研究兴趣,也体现了美国汉学从传教士非专业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时期的混合性。

## 4. 矛盾的价值观

尽管赖德烈以探求宇宙真理为目标,但是一开始就被基督教的思维所局限,所以经常体现出矛盾,因为在著作中提出 19 世纪是“伟大的世纪”,是基督教最为繁盛、影响力最大的世纪,并且未来会更加进步,因此被很多人批评对基督教的过度乐观,而本人又说其实他是基督教的悲观主义者,这体现出其矛盾的心理。另外,赖德烈试图不卷入政治,但他却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关注东方,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和探索东方,而非出于政治目的。由跨文化研究向政治研究

的过渡,由宗教研究向世俗研究的过渡,赖德烈本人也认识到了美国汉学的这种趋势,并提醒美国汉学研究学术界,警惕其为政治而研究的功利目的。<sup>[22]</sup>

### 注释:

[1][4][20]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Beyond the Ranges*. 1969.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pp. 43 - 44, 43 - 44, 9 - 10.

[2]王英杰:《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

[3]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 of - the - 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84. p. 17.

[5][7][美]赖德烈:《现代中国史》,吕浦、孙瑞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40页。

[6][8]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The China That Is to Be*, Eugene, Oregon Stat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1949. Introduction. p. 12.

[9][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0页。

[10]朱政惠主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1]Payson J. Treat, *Review on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 - 1844*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Vol. 6, No. 1 (Jun, 1919), pp. 111 - 112.

[12]WILLIAM M. MCGOVERN, *Review on The United States Moves Across the Pacific*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1, No. 4 (Aug, 1947), pp. 798 - 799.

[13]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moves across the Pacific; the A. B. C. 's of the American problem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New York, London: Harper & Brothers, 1946, p. 64.

[14]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Beyond the Range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p. 43.

[15]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World Servic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of the YMCA' 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ssociation Press, New York, 1957, p. 248.

[16][美]费正清:《七十年代的任务》,朱政惠主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17]LATOURETTE, KENNETH SCOT, *Chinese: their mission and culture*, p. 372.

[18][19]Kim, Taesig. *Can historiography be objective? An examination of the thought of Carl Lotus Becker and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New Orleans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09.

[21]MISSIONARIES SHOWN IN ROLE OF LEARNERS: Aim Now Declared to Work... *The Washington Post* (1923 - 1954); Mar 13, 1927; *Pro - 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Washington Post* (1877 - 1996), p. 10.

[22]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Far Easter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5, Vol. 15 (1), pp. 3 - 11.

[责任编辑:黎虹]